

德热拉斯政治論文集

阿·罗特堡編

(供内部参考)

11

25

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

阿·罗特堡編

賀 芳 譯

(供内部参考)

Abraham Rothberg
ANATOMY OF A MORAL

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59

根据英国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公司 1959 年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

阿·罗特堡编

贺芳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3年11月第一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37.6 字数 687,000

统一书号 3003·691 定价 0.50 元

目 录

序.....	1
新内容.....	19
竞选中的一些次要问题.....	23
新形式.....	28
形式的重要性.....	32
法治.....	36
人人有份?	40
沒有結論.....	44
有目标嗎?	47
理想.....	51
一般和特殊.....	55
具体地说.....	59
答复.....	63
主观力量.....	67
阶级斗争.....	71
新思想.....	75
联盟或党.....	79
一个教训的研究.....	95
革命.....	116

序

密洛凡·德热拉斯所著的这十八篇文章，原载于1953年最后几个月的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报纸《战斗报》，现在是第一次以英译文汇集成册。这些文章记录了当时南斯拉夫第二号共产党人物德热拉斯在担任了显赫一时的十七年领导之后脱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过程。这一在南斯拉夫一度造成政治危机的突然的惊人的分裂，在我们时代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标记，三年之后，德热拉斯本人被投入监狱，至本书编撰时，他还被关在那里。

正如人类思想上的重大启蒙作品所常有的那样，这些文章问世的时候没有大吹大擂或广事宣传。德热拉斯是《战斗报》的经常的撰稿人，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撰写复杂和激烈的散文的作家。因此，这些文章的头六篇被看成似乎是德热拉斯自1945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倾注在这个国家的思想血液中的一系列概念的继续发表。只是在仔细重读之后，才弄清了这些文章的真正含意；只是在回顾之后，党的领袖们才能追溯出这一未引起注意和悄悄地在他们眼前发生的重大的思想演变。克罗地亚的党的领导人兹凡科·勃尔基奇后来指责德热拉斯在他的对手面前隐蔽自己，在开始的时候“极其小心谨慎”，之后，“当他写文章时，喷出了愈来愈多的毒素”。

然而，在12月，当德热拉斯的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章发表以后，“毒素”更加明显了，在负责的共产党人中开始感到不安。就在同年10月4日，铁托已经警告说，可能有必要从这个国家驱除

“旧制度的残余分子”，这些人已“开始抬头，曲解我們的民主化”，他說：

沒有人要想，我更不想，在我們健康的有机体上动新的手术。順从現存的条件对于这些人将更有好处。

铁托所提到的“病害”似乎不可能不久就在中央委员会本身，而且在铁托自己的“继承者”密洛凡·德热拉斯身上爆发出来。但看来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德热拉斯沒有直接攻击党的机构，但他的思想活动看来正指向一个确定不移的危險的方向。

这种忧虑只是靠这样一种安定人心的想法掩蔽起来：德热拉斯毕竟是党的可靠的领导人，他的熟练的辯才一直是促进党的利益的。这样，尽管对于德热拉斯的異端思想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不安，他仍按預定計劃于12月27日“当选”为国民議会主席，而就在同一天，他发表了他对政府机构最尖銳的攻击文章中的一篇，但那时候，他已是这个政府有头衔的領袖之一了！在这篇文章《主观力量》，見本书第 67 頁）中，他說：

人們一度献出一切，甚至生命，去做职业革命者。当时他們对于社会进步是不可缺少的。而今天，他們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馬其頓的党書記克尔斯特·齐尔文考夫斯基回忆說，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們理解到——不是由于我們的理論教育，而是由于我們共产党人的本性而出了問題了”。特別是：

德热拉斯說，我們不需要工会，青年組織，共产主义联盟和国家——总之，什么都不要。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誰来繼續干下去呢？

德热拉斯譏諷地回答說：

是的，多么罪恶的思想！誰将关心（人民的）心灵、觉悟和活动呢？

可是，很奇怪的是，铁托当时并没有打算干预这一异乎寻常的写作活动，尽管他后来承认他极其关切这件事。也许他也为这样许多年的忠实服务所迷惑；当然，德热拉斯的意思不可能是他所说的那样！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向德热拉斯探询他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彼塔·斯坦鲍利奇发现他埋怨“他们”要使他成为一个公务员，而他的计划是围绕他的新杂志《新思想》来组织政治生活。斯坦鲍利奇感到“震惊”，他回忆到铁托有一次说过，“只要任何人一旦说‘我’和‘他们’，那末一切都完了。”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德热拉斯当时正策划对这个人的妻子进行最“恶毒”的攻击——也去找德热拉斯，并且记录了下列对话：

德热拉斯：“听着，泰波，我们将不这样发展下去了。”

泰波：“这是对的。”

德热拉斯：“既然有争论的自由，就必须有组织派别的自由。”

泰波：“不过，站在反革命立场的派别在党内不能存在。”

12月下旬，卡德尔同德热拉斯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卡德尔说，在这次谈话中，德热拉斯认为：

首先，铁托同志是在维护官僚主义，而他，德热拉斯，迟早要同他作斗争；其次，兰科维奇和我事实上同他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是机会主义者，所以不想去同铁托争论；第三，不论我们要不要，一个社会主义的左翼已在我们的国家中涌现出来；第四，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

德热拉斯是否像善于作系统记载的卡德尔所追述的那样以数字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一叙述可能是准确的。卡德尔说，他对德热拉斯的四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而，据他说，由于希望两人间的和解仍然是可能的，他当时没

有將這次談話報告鐵托。鐵托那時在阿爾卑斯山休假，或許他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德熱拉斯的論文所造成的“在許多優秀共產黨人中的可怕的混亂、迷失方向甚至理想的破滅”（齊爾文考夫斯基語）。

隨著群眾情緒的增長，而他的同事們在他的面前日益感到惴惴不安時，德熱拉斯的反應是他在1月4日發表題為《聯盟或黨》的文章（見本書第79頁），在這篇文章中，他實際上要求共產黨放棄作為南斯拉夫政治的統治力量。就在這個時候，鐵托回到貝爾格萊德，他看到——用他自己的話——全國正開始被激動得“沸騰起來”，便準備對德熱拉斯採取行動。但是，他仍然把最後的決定推遲了。這或許是由于他也難以相信在他眼前竟會發生這種對他本人的背叛。

鐵托的錯誤估計付出了很高的代價。1月6日，《新思想》提前出現在報攤上，這是德熱拉斯模糊地希望能賴以團結他的共產黨人中的民主分子的新的文化雜誌，它登載了德熱拉斯寫的關於貝爾格萊德社會中尖銳的個人衝突的長篇報道，在這篇不時令人不寒而慄的報道中，強烈地牽涉到整個政權的道德品質。鐵托終於宣布：“人們一定看到，我們已經忍受到最大限度了。”後來，在詳細敘述這次事件時，他說，“我不得不斷然採取有力行動，我要求立即停止發表他的文章。”一天以後，黨的執行委員會正式擯斥德熱拉斯的文章。1月17日，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德熱拉斯的問題，並結束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的一場惡夢。卡德爾提議把全部爭論包括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在《戰鬥報》上發表，但這一反映卡德爾有趣的個性的異乎尋常的建議被否決了，因為正如彼雅得所說，“這會意味着德熱拉斯將會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分裂黨的領導”。

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是南斯拉夫戰後歷史上的一次決定性

的會議。德熱拉斯的異端理論被拋棄了，現在稱為鐵托主義的中間道路的哲學得出了印象深刻的結論而被確定下來。除了他的勇敢的寫作伙伴弗拉基米爾·德迪熱爾和他的前妻密得拉·米特羅維奇以外，德熱拉斯在會上完全是孤立無援的。儘管他曾幾度驚慌失措地為自己辯護，他終於請求給予他投票贊成一項撤銷他的中央委員職務和譴責他的思想的決議的權利，因為他那時畢竟還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德熱拉斯當時不知所措，在痛苦的窘境中，他脫口說出諸如“我確曾批評過我們的制度的各个方面，但我不是反對整個制度”以及“雖然我個人確信這些思想是絕對正確的，但即使在今天我也沒有要把這些思想說成是絕對正確的”之類的話。在有一點上，他企圖改述他的立場，即他曾認為“共產主義聯盟是我們國家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當時他作了很大的修改，致使它變得毫無內容。

然而，這種驚慌失措是可以理解的。德熱拉斯在他的日益廣泛的攻擊中，從來沒有充分意識到他的純粹是個人的世界觀所含有的具體意義。的確，他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曾左右搖擺。而且他還受到鐵托的巨大權威對這樣一種局勢所施加的情緒上的壓力。當時曾有人說，在德熱拉斯看來，鐵托無異是一個“父親的形象”。從德熱拉斯在整個危機中對鐵托的反復無常的態度來判斷，這種說法很可能是有些真實性的。

如果德熱拉斯的觀點被指責為出自個人的情緒，那麼，大可以同樣指責他的老同事們對德熱拉斯進行的反擊，年高德劭的皮雅杰說德熱拉斯“自高自大”，把他在《新思想》上發表的文章稱為“政治性的色情文學”，把德熱拉斯說成是一個“熱戀他自己和他所說的話”的人。經驗豐富的南斯拉夫外交家阿勒斯·貝布勒爾懷着不容誤解的羨慕告訴德熱拉斯說，“你被你的國際地位沖昏頭腦”，而忘記了“你的重要性是依靠解釋運動的集體經

驗的思想而获得的”。

波斯尼亚共产党人密雅脫維奇說德热拉斯“把我們看成是做骯髒工作的黑人，以便使他那样的一些人能够保有他們高貴的头脑。”在这种忿激的气氛里，德热拉斯的前妻密得拉·米特罗維奇勇敢地試圖开辟一条夹在譴責和辯护之間的道路。人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个人的和意識形态上的尷尬处境。为了替德热拉斯辯护，她說沒有理由要“所有的共产党人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持同样的意見”，但是，以后她又承认她对德热拉斯的文章的理解是“肤淺”的，最后她表示同意“我从同志們那里听到的意見……”。

只有卡德尔和铁托能够超脫这一場人身攻击。铁托以相当亲切和坦率的口吻問道：

为什么德热拉斯要脫离他曾共事十七年的老同志呢？德热拉斯同志有一切机会来发表他对我們的危机所想說的話，甚至可以比他曾經写过的更多。我們知道他，我們之間討論过所有的事情，并且同他开玩笑，在开玩笑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可以說的。

铁托感到驚訝无疑是真实的。人們也不能因他感到德热拉斯对他不够完全誠实而責怪他，因为铁托曾給了德热拉斯那么多。但对于德热拉斯，这算不了什么，因为如果說铁托确曾給了很多，但铁托仍然保留一件德热拉斯現在奉为比其他一切更珍貴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铁托亲自作的父亲般的呼吁是强有力的，并且由卡德尔在理論上作了有力的支持，他系統地剝掉了德热拉斯的基于感情的論辯的基础。在公开辯論的讲坛上，德热拉斯不是卡德尔的对手，卡德尔的邏輯和条理，加上铁托的有克制的权威完全摧毀了德热拉斯的信心。的确，德热拉斯最后說他接受卡德尔的分析

的“百分之九十”——这确是很高的分数！只有德迪热尔仍然是坚定的。他說，“坦白地說，我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不能仅仅因为讲述人的权威而机械地接受一种观点。”但他是孤零零的，甚至連德热拉斯也拋棄了他。德热拉斯宣布了他的下列決定：

昨夜，我得出这样的結論：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願仍然和同志們在一起。相信我，这是我睡得安稳的第一个夜晚。
譴責德热拉斯的決議是一致通过的。

德热拉斯的动摇是一时的。无疑，他由于他在讲坛上的不坚定表現而丢臉，在这个讲坛上，他本来是應該最精辟地闡明他的思想的。可是，如果铁托把德热拉斯的局部屈服看成是有希望的迹象，他就是再一次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德热拉斯对官僚主义制度的仇恨只有加强。4月間，据报道，大概是出于他本人的主动，他放棄了共产党的党籍，这样他自願地切断了同貝尔格莱德官僚政治的最后一点联系。德热拉斯第一次在这一奇特的历史上对上述官僚政治采取了现实主义和适合他的地位的誠实态度。他不再是在共产党陣营内部的一个友好的批評家，而是在这一陣营外部的一个最尖刻的敌人，承担着他的不共戴天的敌对行为的一切后果。事实上，他开始写书，这本书就是在两年半以后为西方所普遍知道的《新階級》。

然而我們在这里所談論的不是德热拉斯精心写成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品（《新階級》），而是他在这以前的思想上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說，这种反映自发的思想发展的变化比它所导致的簡洁和有条理的大块理論文章更为重要。在历史上，德热拉斯的勇敢的抗拒行为，将比他在其后获得的理論发现更为人們所記憶。实际上正是这种抗拒行为和其他事情一道，使《新階級》

成为一部重要的著作。

但是，如果說《新階級》是一部重要的著作，那末，它也是一本多少使人产生錯觉的书。因为它把一个反对严酷的社会秩序的激烈的个人反应轉化成一个分析性的框框，这个框框正像德热拉斯所背叛的制度那样冷酷和死板。在这本暢銷的书中，德热拉斯以惊人的分析力解剖了共产党政权的野蛮的机器。这是一个人所作的最后一次的苛刻的評價，这个人必須在他能够以他的良知把他的十七年生活交付給历史之前，对这段生活加以解釋。因此，我們在《新階級》中可以找到德热拉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著作中所特有的同样夸張的風格，同样的冠冕堂皇的过分单化手法和同样的历史眼界。

但是，抓住共产主义的历史实质这一問題，在德热拉斯正在共产主义的感情的迷宫中摸索出路的时期中，并不在他心里占有最主要的地位。相反，在同共产主义决裂的过程中，他拋棄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实质”的定論，而只是在《新階級》中简单地追述到。因此《新階級》論述了人类力量的概念，而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則更多涉及人类精神的貧困。

在这本文集里，讀者将找不到集体化的灾难，强迫推行工业化的步伐，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問題——共产党爭論的正常的內容。相反，他們找到一个迷恋于人类良知、容忍和同志精神的幻梦的人的論述，农民在劳动时的朴素的平等待遇，在戰場上的革命軍隊的公平和坦白，以及儿童在嬉戏时的自由自在。这些都是人类的教养和誠实的典范，德热拉斯以此来衡量共产主义前进时的严格和枯燥无味的秩序，并且发现它是不足的。他在題为《形式的重要性》（見本书第 32 頁）一文中說，社会主义必須根据这样的标准来評價：

……道德和社会准則、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既定习惯、討論

方式、获致决定的方式等。总之，一切取决于我們如何生活，我們如何解决我們自己之間的問題和冲突。

他以通常对哲学上的細致区别的爱好宣称：社会主义的內容已經得到了，但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在我們的生活中显然沒有具备。德热拉斯对于“形式”这个名称赋与了生活和純良的人类行为的概念，这种行为受法律管轄，而具有文雅的态度的特点，一切听其自发。这种概念很可能出自他青年时的幻梦，这在他的一本美丽的书《沒有审判官的国土》中提到过。当然，这一概念，即一个自然的、大众的、合法的和自由的社会，同人們所知道的任何共产主义教义，而且就这一点而論，同德热拉斯自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說过的話，都沒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問道：如果“普通的人民不能够自由地安排相互間的关系……，那么，今天的合理化的工业和商业还有什么用处呢？”

往日是生气勃勃和火炬；如今只是軟弱无力和熄灭的灰烬。……

貫穿在这些文章特别是早期的几篇文章之中的思想是，本质善良的原始的人类力量将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冲破出自不符合人的本性的源泉而强加的刻板的教条和严格的社会习惯。这些自发的力量不需要政府的监督，只需要新鮮的空气，广闊的社会，适合于真正的創造性的呼吸空間和朋友之間的直接而公开的接触。这一主题是單純的，反映着德热拉斯在蒙特尼格罗渡过的青年时代的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他把蒙特尼格罗人賴以管理他們的生活的粗糙的和非正式的司法以及附近土耳其村庄在优美的建筑基础上盛行的柔和的、雅致的习惯全都理想化了。当德热拉斯，举例說，隱約地把两个老同志的年代长久的婚姻的不幸破裂同当前政治上的分手联系在一起时，他以一种出自內心的天真来描述这些幻想。

德热拉斯为当时的气氛所窒息。他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意识到某种普遍的感觉时，他明白地指出，“正如大多数的领导一样，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在另一点上又宣称，共产主义组织被卷进了“教条的、道学的、无用的和无意义的讨论，而生活却从他们的身旁走向前去”。凭借他个人的远大的眼光，德热拉斯在题为《答复》的论文（见本书第 63 页）中用以下的话总结了他的文章的内在的重要性：

这些批判性文章的社会和个人意义是冀求摆脱“社会中坚”的不现实的抽象世界，尽可能深入地走进普通劳动人民和平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现实世界。

在革命时期，“教条”同“普通人”的生活和需要之间曾有直接的关联，德热拉斯卓越的技能成了这些教条和它们所鼓动的群众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这就使他的生活具有意义。但今天，“革命只是一种负担……一种光荣的传统，而不是生活”。德热拉斯所失去的正是生活，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息息相关，真正接触到群众的脉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味。他在越过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向“普通人”发出的呼吁中所寻求的也正是这种生活。他现在以为在“普通人”中间可能再找到这些东西。德热拉斯寻求保持的不是权力，而是复杂生活和需要的深刻意义。他终究掌握了这一事实：尽管赐给他的荣誉不断增长，官僚秩序已不再真正需要他的技能了。曾经用热烈的口号凝结起来的关系，现在靠精心设计的国家机器连结在一起。德热拉斯已经仅仅成为这部机器的思想方面的橱窗，对国家机器来说，口号、思想意识以及所激起的热情已成为次要的考虑。

随着 12 月 27 日《主观力量》一文的发表，德热拉斯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富于政治性和更少带个人成分的思路。但是，即使在这些最后的文章中，他的建议显然仍带有个人的和人情的

味道。尽管曾强迫要他宣布明确的政治行动綱領——例如，在党内建立一个特定的派別——他坚决不提出这样的倡議。反之，他只是反复提出籠統的要求：“根本改变”日常生活的性质；加强“生活和傳統方式、现实和教条之間……的斗争”；把党轉变成一个排除野心家和食客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在思想上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联盟”。然而，尽管他尖銳地攻击共产党，他仍然认为党是唯一可想像的政治和政府的工具。他憤怒地問道：“誰要‘解散’共产党？在我們国家里，党不是恢复了我們国家的青春和美丽嗎？”

德热拉斯坚定地拒絕提出一个具体的綱領，使他赢得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者的称号，但他的拒絕并不缺乏某种給人深刻印象的一貫性。归根到底，他的攻击的主旨是他认定“普通”人能够按照正义和人道原則管理自己的生活，而并不需要上級的干涉；政府的问题只是提供便于达到这种自治的条件。德热拉斯不主張有行动綱領，因为他的文章实质是要求断然取消行动綱領。他认为某一集团比另一集团更懂得国家的真正需要的日子已經过去了。在《一般和特殊》（見本书第55頁）一文中他写道：

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

因此：

除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討論，更自由地选举社会、国家和經濟机构以及更遵守法律之外，沒有其他代替办法。这就是德热拉斯真正接近于对南斯拉夫的未来所提出的具体建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討論，更自由地选举……”。他繼續說：唯有在公开的社会里，适应新的需要和問題的新穎思想才能产生。在他的《新思想》的文章里，他声称：

如果新的思想在萌芽时就是大多数人的思想，那末一切事

就会变得美好和简单了。然而，新思想不是、并且永远不能是这样。……新思想总是少数人的思想。……

他写道，“只能由經驗”来证明某一种思想是否是“进步”的，同时：

……只有把思想傳播开来，人民圍繞它并为它而奋斗时，这种經驗才有可能获得……

真正民主的共产党员永远不应忘記这一点……所有新思想乍一看来都是“愚蠢的”、“精神錯乱的”和“不合邏輯的”。

德热拉斯对民主社会的这些基本前提的主張就是他对不断扩大的自由社会概念的合乎邏輯的一个对称部分。所有在开始时是对于共产主义政策的微小限制的单纯抗議，后来却发展成为自由的人们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根本信念的强烈表示。最初的抗議是出自一个閉关固守的社会的感情压抑的本能的反抗。但是这种抗議朝向近乎一种信念的急速轉化反映出比原来激起抗議的事物远为巨大的长期潜藏着的力量源泉。德热拉斯按他独特的方式概括了一系列事件，来綜合整个国家的經驗，然后把这种經驗和整个世界的敌对思想間的斗争結合起来。这样，在1954年初，在他背叛后的第四个月，德热拉斯从初期的徘徊中突然采取一种立即引起国际反响的政治姿态。

最后一击不久就到来了。它采取了冗长而刻薄的論文形式，即1月初在《新思想》上发表的《一个教訓的研究》，也就是这本文集的标题（中譯本以原书的副题《德热拉斯政治論文集》作为书名——譯者）。这篇文章把德热拉斯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社会生活帶到了一个峻峭的高峰，在这场政治战斗的年代里，这篇主要談論为爭夺社会地位而背后諛謗的女性間斗争的文件，确实是很奇特的。但关于这些瑣碎冲突的叙述表达了德热拉斯过去所写的各种文章的实质，就这一点而言，这一“研究”便成了

有力的政治武器。这篇把精彩的人物性格的描写和问题很多的鬧剧結合起来的文章描述了据說是由貝尔格萊德新的社会阶级为了对付一个“美丽年青的女演員”而筑起的“巨大、冷酷和不可穿透的墙”，这个女演員曾在前一年的6月同陸軍參謀长彼科·达普契維奇將軍結婚。作为一篇文学作品，这篇文章从生动的描述轉到粗獷地夸張的对話，这些生动的描述預示着将撰写一本經過仔細推敲的书《沒有审判官的国土》，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很快就不滿足于上述对話的写法。的确，有理由相信，德热拉斯从他的戏剧性地描写的事件中所受到的感触比从这个被損害的妻子所受到的感触更深。

就这样，这个有着一个漂亮嗓子的年青美丽的女演員正是德热拉斯寄予全部希望的“普通”人之一；而那些排挤她的世故而頑固的女人們正象征着他在南斯拉夫社会里所憎恨的一切。这些女人們咒罵这个女演員，是因为她以她的嫵媚“引誘”和“鈎上了”寡头政治所寵爱的单身汉；是因为她本人在战争时期沒有和游击队一起作战，虽然那时她还是孩子；是因为她毕竟和舞台有关系，而这种出身对于貝尔格萊德社会“道德高尚”的領導成員之一來說，是成問題的。在德热拉斯看来，这个教訓却是可怕的和令人吃惊的。在他不留情的笔下，南斯拉夫“大人物”的夫人們具有：

……一种維持既得社会地位的强烈兽欲存在，有一种比野兽間任何肉搏还愚蠢、野蛮、可怕和殘酷的兽性存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仅仅由于一个青年婦人的出現，那个小圈子的社会地位好像就突然受到了致命而深不可測的威胁，这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不知名和出身低微的女人，她不仅沒有参加战争，而且还不能成为党的基层核心和学生党委会的普通成員，而更重要的是——請注意！——她还是